

集合量词的认知研究

宗守云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合量词的认知研究/宗守云著.—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03
ISBN 978-7-5100-1380-5

I. 集… II. 宗… III. ① ② I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第 号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4BYY029)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S30402)

集合量词的认知研究

著 者:宗守云

责任编辑:陈晓辉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图文设计工作室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64077922)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

字数: 千

版次: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

定 价: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张谊生

量词是汉藏语系诸语言所具有的、颇具语言类型特点的准粘着性实词，其性质、功能、特征和用法等，都颇具有研究价值。然而，多年来，汉语量词研究的重点几乎都在一些个体量词上，尤其是常用的名量词上，对于其中比较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一类——集合量词，关注就少得多。迄今为止，即使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也不是很深入，更遑论系统、全面的探索了。有鉴于此，本书作者以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等理论为基础，采用总体讨论、内部比较、个案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集合量词展开了全方位的探讨、比较与辨析。

本书既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在考博之前，宗守云就在广西师范大学申请到了这一重要的国家课题，并开始着手对集合量词展开前期研究。200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鉴于科研的时间、精力和条件，我们从一开始就商定，博士论文的撰写与国家项目的完成，紧密结合起来。在此后的三年中，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与商量。作为导师，我非常清楚，本课题的研究从理论的借鉴、材料的搜集到构架的搭建、观点的论证，作者克服了大量的困难，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本书以总说与分论为研究模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集合量词的系统性研究。作者首先对集合量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了概述，又进一步阐明了集合量词的定义、性质、范围和类别。在此基础上，对集合量词的组合与重叠现象作了详尽的考察。下篇是集合量词的个别性研究。作者分别对双数量词、“行”状量词、“叠”状量词的内部差异作了详细的比较和分析。接着又对“批”和“群”、“组”和“套”、“丛”和“簇”、“束”和“捆”四组集合量词作了多角度的辨析，揭示了一系列集合量词的使用规律。最后，作者还从范畴化角度对“副、串、堆、包、把、束”六个集合



量词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分析。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写得有根有据、入情入理，论述和分析既有深度又有章法，说明和解释也颇能令人信服，充分显示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坚实的理论功底和踏实的研究风格。由于作者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理解比较透彻，又具有非常扎实的语言研究功底，并且注意借鉴前人在集合量词方面的各种研究成果，加之又充分占有了第一手的语料，还能有意识地广泛汲取和充分利用其他有效、有用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因此，文章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综观全书，可以说创见频现、新意迭出，不少问题的提出及其解释，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无疑是迄今为止汉语语言学界研究汉语集合量词的一项富有独到创见的、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的重要研究成果。

毫无疑问，限于学识与精力，本书一定还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守云自己也认为，本书的出版只能代表其量词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我相信，作者一定还会在汉语量词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展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我热切地期待着作者有更多的新成果面世。

2010年2月5日



引 言

本书是从认知视角对现代汉语集合量词进行研究，是为“集合量词的认知研究”。在引言部分，我们准备介绍选题依据、研究任务以及研究思路，主要目的是明确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确定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一、选题依据——为什么研究

1.1 符合选题规律

本研究的特点是：用热点理论解决薄弱问题。这是选题的一般规律。在语法学界，集合量词的研究比较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对集合量词的系统研究乃至对整个量词系统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当前语法研究所赖以运用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之一，它和语法化、类型学等理论一道成为当前语法学界普遍推崇的理论与方法。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验证认知语言学理论，甚至推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1.2 符合研究趋势

汉语量词的系统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以列举为取向的量词类别研究时期，二是以关系为取向的量词选择研究时期，三是以解释为取向的量词认知研究时期。我们现在正处于量词系统研究的第三个时期，虽然认知视角下的量词研究在理论上还不够完善，在方法上还不够完备，在操作上还不够成熟，但总的发展前景是非常看好的，因为量词研究有描写主义的深厚积淀，如果再辅以认知主义的充分解释，相信汉语量词研究会不断深入下去。总的看来，量词的认知研究是符合研究的总趋势的。

二、任务拟定——研究什么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集合量词。任务有以下一些。



首先，对量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说明，进而对研究对象——集合量词作出整体性分析，具体考察内容包括：给出集合量词的准确定义，在形式和语义相结合的原则下确定集合量词的范围，并进一步划分出集合量词的小类，同时对集合量词的性质作出说明；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中的范畴化理论和原型理论确定典型集合量词和非典型集合量词。

其次，对集合量词的语法属性进行描述。集合量词的语法属性包括组合和重叠两种情况。集合量词的组合包括^①：“数词+集合量词”组合格式；“数词+形容词+集合量词”组合格式；“成+集合量词”组合格式。我们需要对这些组合的规律进行描写，并从认知的角度予以解释。集合量词的重叠是一种构形现象，少量集合量词可以按照“XX”的方式重叠，多数集合量词是不能直接按照“XX”方式重叠的，必须先和“一”组成数量短语，然后才能重叠，这样的重叠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XX”和“一X—X”，严格说这并不是集合量词的重叠，而是数量短语的重叠。但这样的重叠和集合量词密切相关，因此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需要对“一XX”和“一X—X”在各个层面上的差异进行描写，并对二者的差异作出认知上的解释。

再次，通过对具体集合量词的分析描写，就集合量词之间的语义差异规律以及单一集合量词的范畴化过程规律进行揭示。分三种情况。一是对系列相关集合量词的差异进行说明，二是对成对相近集合量词进行对比分析，这两者需要从认知的角度加以解释，三是对单一集合量词进行范畴化研究，确定其中心成员，把握其扩展路线，进而勾勒出单一集合量词范畴化的总体过程。

三、思路剖析——怎样研究

3.1 理论和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主，同时有选择地运用结构主义理论、语料库语言学理论、语法化理论、类型学理论、构式语法理论等等，

^① 集合量词的组合还应该包括“指示代词+集合量词”这样的组合，但这种组合一般被认为是省略了数词“一”，当然实际情况也许比较复杂，另外其组合情况相对简单，故本研究不再涉及。



在对事实观察、描写的基础上展开讨论。

在认知语言学理论中，“认知”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所谓认知，其实就是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也是信息加工的过程。认知是人脑对客观真实世界进行处理、从而能动地认识客观真实世界的过程。认知的本质在于主观和客观的互动，它不是对客观真实世界的刻板的、机械的反映。语言是认知对客观真实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把认知看作是客观真实世界和语言的中介。认知和语言密切相关，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了解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认知规律解释语言现象。这是认知语言学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运用这样一些概念。

隐喻 (metaphor) 和转喻 (metonymy)。隐喻和转喻都是作为最重要的认知模式存在的。隐喻是利用概念之间的相似性，用一种概念喻指另一种概念的认知方式。转喻是利用概念之间的相关性，用一种概念转指另一种概念的认知方式。隐喻往往牵涉到两个认知域，隐喻的过程是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转喻往往是在一个认知域内，转喻的过程是用这个认知域内显著的、接近的因素代表整个认知域。其实通俗地说，隐喻就相当于修辞学的比喻，转喻就相当于修辞学的借代。不过和修辞学不同的是，修辞学的比喻和借代是临时性的修辞方式，而隐喻和转喻是各个层面的语言表达，涉及词汇、句法、语用等各个方面。比如，“一堆土”和“一堆人”是不同的，前者是直接表述，后者则是隐喻表述，是把无生命物的成堆性质映射到有生命的人上，利用相似关系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再比如，“一朵花”和“一枝花”，在客观真实世界中可能是相同的，但它们在人的认知中是不同的，“一朵花”是常规选择，“一枝花”则是转喻，“枝”本来是用来描述花茎的性质的，花茎是细长的，因此是“一枝”，而“花”也用“枝”来描述，显然是用相关的描述花茎的量词转指“花”了，因此这是转喻的用法。

像似 (iconicity) 和识解 (construe)。像似被认为是语言的一种性质，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常常说“语言具有像似性”。所谓像似性，是指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二者关系是有理据的、可以论证的。比如，复数的内容比单数多，因此复数的语言形式一般也比单数



要长。再如，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是在场者，因此各种语言中都存在第一、第二人称指示词语；第三人称的所指对象不一定是在场者，因此有些语言中没有第三人称指示词语。就量词而言，表形状的量词一般都有像似的性质。表形状的量词绝大部分都是从名词发展来的，它们在内容上必然要积淀名词的语义性质，但在形式上，作为量词，它们要为所联系的名词性成分分类，把它们所积淀的语义性质以分类的方式投射到所联系的名词性成分上。因此，这样的量词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一致性和理据性，具有像似的性质。比如，“一条黄瓜”，具有长条状的像似性质，“条”在内容上积淀了“长条”的语义性质，在形式上给具有长条状性质的“黄瓜”分了类，这说明了量词“条”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一致性。如果说像似反映了语言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联系，那么，识解则反映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识解是一种认知方式，这种方式是主观认识的产物，不一定和客观真实世界一致。识解往往可以通过“把……看作/当做……”的形式来表现。比如，“一张纸”在客观真实世界中是三维的，不但有长度和宽度，而且也有厚度，虽然厚度是非常小的，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二维的事物，也就是说，“一张纸”在主观世界中被识解为一个平面事物。

视角 (perspective) 和凸显 (salience)。视角是观察事物的角度。同一个事物或情景，说话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察角度理解，并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中国传统的例子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外国舶来的例子是“半瓶酒，乐观者说‘还有一半呢’，悲观者说‘就剩一半了’”。视角和参照点 (reference point) 是一致的，“以……为参照点”就是“……的视角”。比如某人打电话要到对方 (听话人) 那里去，他既可以说“我这就去”，也可以说“我这就来”，前者以说话人为参照点，是说话人的视角；后者以听话人为参照点，是听话人的视角。再比如，“一条船”和“一只船”视点是不同的，前者着眼于船的外形，船是长条的形状，略大；后者着眼于船的性状，船是一个独体，略小。凸显表明某个对象在说话人心目中是突出的，该对象作为凸显者，是说话人所注意的焦点。同一个情景，凸显对象不同，语言表达也就不同，“手机在书上面”和“书在手机下面”，情景是完全相同的，但前者凸显的是“手机”，后者凸显的是“书”，这是说话人注意的焦点不同造成的。汉语中，



同一个名词，有时可以选用不同的量词组配，如“一把椅子”和“一张椅子”，前者凸显的是椅背，因为椅背是可以一手抓持起来的，后者凸显的是椅面，因为椅面可以被识解为二维的平面，是椅子的功能性部分。凸显常常因语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如汉语说“一把剪刀”，相应的英语表达是 a pair of scissors，汉语凸显的是刀把儿，刀把儿是用手抓持的，所以用“把”；英语凸显的是两刃，所以用 a pair of。当然英语的 pair 并不是量词，而是单位名词。

意象 (image) 和图式 (schemas)。意象是人脑中反映客观事物和情景的形象和印记。它是概念和概念结构形成的具体方式，是人理解和把握某一感知事物和情景的能力。意象的形成和视角、凸显有关，也和属性选择、详细程度有关。同样和事物和情景，由于观察视角不同、凸显对象不同、属性选择不同、详细程度不同，在人脑中形成的意象也就不同。比如，同样是一只又大又黑的蚂蚁，我们选择不同的属性进行表达，会在大脑中形成不同的意象，“大蚂蚁”“黑蚂蚁”“大黑蚂蚁”是三个不同的意象。再如，“一只昆虫”“一只蚂蚁”“一只大黑蚂蚁”在客观真实世界中可以是同一事物，但所形成的主观意象显然是不同的，这是详细程度不同造成的。图式是人脑中反映事物之间基本结构关系的认知结构模式。图式和意象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认知结构。但由于意象和图式具有相同的认知功能，即它们都是人们通过完形感知、动觉经验获得的认识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能力，所以也可以把意象和图式并在一起使用，是为意象图式，不过意象图式更倾向于表达图式的涵义，不倾向于表达意象的涵义。

除了上述这些概念以外，认知语言学理论还常常用激活 (activation)、互动 (interaction)、投射 (mapping)、突出 (prominence)、辖域 (scope)、脚本 (script)、射体 (trajector)、陆标 (landmark) 等概念来界定、描写、解释语言现象，从而形成一整套关于认知的语言学理论。这些概念在研究集合量词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助作用。

还有关于范畴、范畴化以及相关的一些概念，更是我们重点运用的内容，关于范畴化理论及其对汉语量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将在上篇第一章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包括：理论方法（理论本身就是方法，比如，运用范畴化理论研究量词对名词的选择）；一般方法（归纳与演绎、综合与



分析、比较与统计等，比如，运用比较法，对相近的集合量词进行分析，找出它们的本质差异和一般差异）；专门方法（分布描写、语义特征分析等，比如，运用分布描写的方法对集合量词与数词、形容词、“成”的组合规律进行描写分析）。

3.2 语料和引证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语料库。共使用两个语料库：北京大学汉语言中心语料库（网络版）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二版）。前者包括现代汉语库和古代汉语库，该库在2006年末2007年初进行过更新，更新后规模达8亿多字节。后者由袁林主持研制，收入文史类古籍830种，共3.5亿字。

网络检索。在百度、谷歌、人民网等检索工具中进行检索，基于语言发展这样的事实，网络检索应该有其独特的价值，它可以反映当前汉语语言的状况。但有些个别用例必须剔除，因此，在选取网络语料时，要考虑材料出现的数量，数量大的应该是一般用例，数量小的应该是个别用例。

前人研究的材料。包括论著和词典中的用例。

个人语感与个别询问。在具体考察中首先根据个人语感拟出例句，然后进行个别询问。如果大家都认可这样的说法，也可以作为研究的材料。

在行文中，有些语料以短语形式出现，如果不止一个，用分号隔开；有些语料以句子形式出现，我们尽量保持句子原貌，但有时为了方便论述，也适当地进行了一些删改。本研究除了古代汉语用例以外，除非有特别的用途（如用作标题、转引或仿引前人的用例等），一般都不注出处。不合语法规范的用例前面标“*”，语感上不太容易接受的用例前面标“?”。

本研究还广泛参考了一些前人的文献，引证了一些前人的观点。在体例上，如果只引用观点，我们根据惯例用“作者（年代）”或“（作者年代）”来表示，如“陆俭明（2003）”或“（陆俭明2003）”，表示引证陆俭明先生2003年的文献；如果需原文引用，还要给出具体的页码——（作者年代：页码），如“（陆俭明2003：245）”，表示引证陆俭明先生2003年的文献，引证内容在第245页。一些复杂的引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原则，灵活处理。引证文献见后附参考文献。

3.3 内容和体例

内容上，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集合量词的系统性研究，下篇是集合量词的个别性研究。上篇共分三章。第一章是理论与方法，介绍认知语言学及其范畴化理论，并说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量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二章是定位与区分，分两节，第一节对集合量词的定义、性质、范围和类别进行定位，第二节对典型集合量词和非典型集合量词作出区分，并给出从典型集合量词到非典型集合量词的连续统。第三章是组合与重叠，分别就集合量词与数词、形容词、“成”的组合情况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并对集合量词的重叠问题作出分析。

下篇共分三章，主要对典型集合量词进行个别性分析。第四章是系列相关集合量词的差异研究，对三组系列相关集合量词——双数量词、“行”状量词、“叠”状量词进行辨析和解释。第五章是成对相近集合量词的对比研究，对四组成对的集合量词——“组”和“套”、“批”和“群”、“丛”和“簇”、“束”和“捆”进行对比和解释。第六章是单一集合量词的范畴化研究，对六个单一集合量词“副、串、堆、把、包、束”的范畴化过程进行描写和解释。这三章总的安排方式是根据包含集合量词数量的多少，按照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

体例上，上、下两篇都按照章节体例安排。各章节小标题按一、1.1、1.1.1层次标示，如果有更下一层，用a、b、c标示。例句以节为单位一排到底。注释一律用脚注，不用尾注。

最后顺便说一下本书符号的使用。为了便于行文和节省篇幅，在必要时用“X”来替代量词，主要是集合量词；用NP替代体词及体词性短语；用VP替代谓词及谓词性短语。



上 篇

集合量词的系统性研究

第一章 理论与方法

本章讨论集合量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们首先讨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范畴化理论论述。认知语言学理论是以语义为重点的理论，而量词具有丰富的语义特性，因此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指导汉语的量词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在《引言》中，我们提到了本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包括认知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语料库语言学理论、语法化理论、类型学理论、构式语法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能够不同程度地为集合量词的研究提供指导和帮助。如语法化理论。语法化理论是有关语言历时发展规律的理论，包括实词虚化、语素抽象化、新的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等内容。在集合量词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运用有关语法化的理论和知识对集合量词的历时状况作出解释和说明，从而验证集合量词的共时范畴化状况。再如类型学理论。类型学理论是有关从跨语言的角度研究人类语言的理论。对集合量词研究而言，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待汉语的集合量词，不仅可以为汉语集合量词提供更加宏观的研究背景，也有助于对不同语言的集合量词作出比较，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汉语集合量词。

由于课题的关系，本研究最常涉及的是认知语言学理论，而在认知语言学理论中，又以范畴化理论最为重要。本章首先讨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然后介绍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理论，最后揭示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汉语量词研究的关系。

一、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

1.1 理论基础

1.1.1 体验主义的哲学基础

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在对认识论的研究上一直存在着经验主义和



理性主义之争。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人的经验来源于外部的客观世界，因此在研究中，观察、归纳是最重要的。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是先验存在的，是心智自身所固有的，人的感觉印象容易出错，因此经验是不可靠的，在研究中，演绎、推理才是最重要的。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表面上看是水火不容的，实际上它们有着深刻的共性，那就是，它们都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严格对立起来，一边是客观物质世界，一边是主观理性世界，一方面，客观物质世界的范畴和关系是独立于人的意识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人的心智和思维与身体经验分离，是不依赖于外部的客观物质世界的。

因此，认知语言学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称为客观主义，而把认知语言学的哲学称为“体验哲学”（lakoff & Johnson 1999），是为体验主义的哲学基础。

认知语言学在哲学上一反客观主义关于主客观的二元对立，强调身体经验对于人类心智和语言的作用。这种体验哲学强调的是“身心合一”或“心寓于身”，约翰逊的经典名作就叫《心中之身》。具体说来，体验哲学包括以下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lakoff & Johnson 1999；王寅 2007）。心智的体验性是指，人的心智不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镜像，也不是先验的，而是由于人的身体经验形成的，特别是运动感觉系统的经验。“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及其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lakoff & Johnson 1999：497；王寅 2007：57）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人们对心智中所思所想的内容是没有直接知觉的。虽然人在表达和理解的时候，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话语，都要涉及许多认知运作程序和神经加工过程，但整个过程往往都是无意识的。不仅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等神经加工过程不能被意识到，而且大部分推理也不能被意识到。思维的隐喻性是指，隐喻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相似性会引导我们获得基本隐喻，隐喻是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大部分抽象思维都是靠隐喻实现的。

1.1.2 认知主义的心理学基础

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主义心理学是相互对立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认



为，不应该研究意识，只应该研究行为。行为主义心理学主要运用“刺激—反应”模式来解决心理学问题。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渗透到了很多人文学科中，甚至还出现了“行为科学”的名称。行为主义心理学也影响到了语言学，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就吸收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成果。行为主义心理学由于抛弃了意识，不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被认为是偏离了心理学的主题。

认知主义心理学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专指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研究意识的认知主义心理学。狭义的认知主义心理学把人类心智看作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包括感觉输入的编码、贮存和提取的全过程。这种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可以用计算机来类比人的内部心理过程，计算机接受符号输入，进行编码，对编码输入加以决策、存储，并给出符号输出。这人的信息加工有相同之处。另一种是广义的，指一切涉及认知的心理学，比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就属于这一种（赵艳芳 2001：17）。

认知语言学是以广义的认知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特别是对皮亚杰理论的继承。和广义的认知主义心理学一样，认知语言学也强调心智和认知的关系，主张认识来源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的的作用，认识结构是后天构建的。广义的认知主义心理学中有“图式发展理论”，认为可以将感知以整合的方式组织成图式结构，认知的第一图式是动觉图式，然后是目的图式，这样就产生了心智的萌芽，进而可出现更为复杂的经验图式，逐步形成抽象思维，获得运算图式（王寅 2007：20）。认知语言学接受并发展了图式理论。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还把“意象”和“图式”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构建了“意象图式”理论（Lakoff & Johnson 1980）。

1.1.3 功能主义的语言学基础

认知语言学所秉持的是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尽管对语法中的功能因素的倚重程度有所不同，几乎所有认知语言学家都持有功能主义语言观，它是认知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派最重要的分歧之一，是认识其基本理论的出发点。”（张敏 1998：11）

功能主义语言学是和形式主义语言学相对立的。功能主义语言学 and 形



式主义语言学最根本的分歧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语法天赋说的态度，一是对语言自主性的态度。形式主义语言学认为，人类大脑里有一套先天的语法装置，这套语法装置是抽象的，是进化来的，它具有普遍性特征，是不因人种、民族、国别、语言的不同而不同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小孩子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自己的母语，正是先天语法装置作用的结果。功能主义语言学认为，所谓人的大脑里有一套先天的抽象的语法装置，只是一种空洞的假说，是没有办法证实的。语言的先天基础肯定是存在的，不然就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人有语言能力而动物没有，但语言的先天基础是人类特有的认知、推理能力，而不是什么抽象的语法装置。

形式语言学还认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认知系统，语言能力可以独立于人的其他认知能力；句法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是独立于语言结构的词汇和语义部分的。因此，研究语言应该从语言内部着手，从语言自身对语言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认知系统，语言能力和人的其他认知能力相关，对语言的描写必须参考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句法分析是不能离开语义的，“在表达和理解语句时，句法、语义、语用三者并没有明确的分界，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三者交织在一起。”（沈家煊 2005：4）因此，对语言的描写和解释应该诉诸外部，应该从身体经验、知识信仰、语言环境出发对语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1.2 价值取向

1.2.1 对概念语义的重视

形式语言学重视句法形式，认知语言学重视概念语义。在认知语言学看来，意义就是概念化。语义不仅仅是真值条件，语义和概念结构以及概念结构形成过程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语义仅仅理解为客观真值条件，那么对同样一个客观事物来说，就只能有唯一的一种表达，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同样的被子，我们既可以说“一条被子”，也可以说“一床被子”，这显然不是由真值条件决定的，而是由不同的概念结构决定的，说“一条被子”，其概念结构是建立在“被子”自身的特征之上的；说“一床被子”，其概念结构是建立在“被子”所处背景的基础之上的。再比如，

